

“探秘商丘故城”系列之七十

宁陵城(十四): 一代真儒的故里友情(下)

【阅读提示】

如今的微信有朋友圈,QQ有好友圈。朋友,是一种特殊的温暖。清代蒲松龄说:“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,快友之事莫若谈。”孟子则云:“人之相知,贵在相知,人之相知,贵在知心。”

吕坤作为一代大儒,一生结交了很多朋友,有学术圈的,有行政圈的,有外籍的,也有家乡归德府的,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或多或少影响着吕坤的思想与活动。在吕坤离世后,睢州的大儒汤斌成为他的隔世知音,成为他在清朝受到推崇的重要推手。

同时,吕坤注重在朋友圈里择贤而姻,为子女选择好的生活环境。除上篇所说的与沈鲤、杨东明结为姻亲外,他还与商丘的杨楫、睢县的阮台阳、杞县的黄元士等好友结为姻亲。吕坤的二儿子吕知思(曾任光禄署丞)娶商丘杨楫的女儿杨宜室为妻。清康熙四十四年《商丘县志·选举》载:“杨楫,万历甲辰二年进士,任山东金乡知县,迁御史,仕至陕西按察使佾事。”吕坤长女吕中仪嫁杞县生员黄元士。



阮台阳像

与阮台阳:忘年之交 结婚亲重善行

在吕坤的商丘生活圈里,有一位“忘年之交”,并且结为姻亲的好友——河南睢阳卫(今商丘睢县)的阮台阳。

据郝涵《吕坤年谱》记载,明万历三十年(1602年),67岁的吕坤在宁陵讲学,睢州阮台阳的叔父阮凤带着他到宁陵从学吕坤。因此,两人有师生情谊。吕坤感觉阮台阳“其人冲挹温秀,吾与言善,津津然嗜之若渴。吾喜之,盖亦喜余云”(吕坤《阮台阳墓志铭》)。因两人志趣相投成为好友,明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“生见吾孙而以季女许之”,结为姻亲之好。

阮台阳(?—1609年)的祖籍为福建连江,“以义兵从渡江,遂籍睢阳”(吕坤《阮台阳墓志铭》)。阮台阳父亲阮国信,以《春秋》中嘉靖甲子科(1564年)举人,任山东省鱼台县知县(清光绪《睢州志·

选举志》)。阮台阳,初名阮大孝,李文宗爱其文,为之更名阮齐贤,号台阳。先是三妻而无子,妾宋氏生次女,嫁于吕坤之孙吕慎多为妻。吕慎多,字减之,号莲舟,崇祯元年(1628年)进士;授湖广德安府推官,升刑部主事员外郎;因义施邻里,乡人曾制“万人屏”颂之;父户部郎中、吕坤次子吕知思。

阮台阳对吕坤的慈善思想有很大影响。阮台阳家境富裕,为人慷慨大方,富而能散,生平以行善为乐趣。如他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堂兄从弟、亲戚子侄,“重三族堂兄大忠病而贫,以地四十亩给其朝夕,歿之日,棺以杉,赠孝布八十四。大忠之子庠生歿,亦以杉棺厚葬之。群从兄及兄弟子之贫者,岁给衣食有差。舅氏耿效忠无子,生养之终身,葬如礼。诸耿氏子皆为生计,令无失所”(吕

坤《阮台阳墓志铭》)。

对生活有困难乡里百姓,阮台阳一方面出资助其婚娶,“嗣州里不能婚娶者,若王、周等五十家,皆为完娶”。另一方面设义冢助其丧葬,“不能葬者,为立义冢六,棺皆生给之”。如遇上大寒之年则捐棉麻衣,碰上大疫之年则捐粮舍药,遭逢大欠之岁则输粮赈济。

阮台阳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,如“厚学校,修州学,助工银三百两,输钱十万给本州贫生。又输银百两于归德府,给八县贫生建义学,延师训贫家子,供一切馆舍费,纾国用”。

此外,阮台阳还积极支持地方政府的救灾活动,如“万历丙申年,河决苏家庄,陵运为忧,水衡告匮,生输银三千两。是岁,睢州又起夫四百名治河,生输工食粟粟二千石,忌河并径曹公旌其里”。

与侯执蒲:勉励后学 社稷苍生为责



侯执蒲像

吕坤与商丘侯氏家族关系颇密。明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春,商丘侯执蒲中进士,吕坤作《贺侍御侯碧塘》,书以“世俗所不道者”贺之。文中指斥吏治风气之败坏有云:“而今世界打成一片牢不可破之熟套,总之,不念民生,奔走世态”而已,而勉励其“以伊尹之所志为已任,以社稷苍生为已责”。侯执蒲(1569—1641年),字以康,号碧塘。曾任宁津县令,监察御史,官至太常寺卿。

在家乡,吕坤很注重提拔后学,曾勉励家乡的张恕吾为仁人孝子。张恕吾,宁陵人,军籍,其姊为吕坤之弟妇。他于明万历八年(1580年)清袭其先人之爵,是岁赴京参加军政考选,得上考。吕坤因次撰《赠张恕吾序》以赠之。

吕坤与游学梁宋、卜居柘城的福建莆田人梁补交情深厚,明万历十年(1582年)曾延之于宾馆,令二子师事之。梁补,号少澜,人称梁处士。他以宿学闻名商丘一带,所到之处履满户庭,学大夫徐公赏

其文后赞为“璞玉”。明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,吕坤“亦入乡学,闻处士名,不及见,然窃慕之。后相与知名士,问所师,则多处士弟子也。又藉其称处士,余愈益向慕焉”。后来,吕坤终有机会见到了处士梁补。明万历十年(1582年),吕坤从吏部文选司郎中回宁陵休假,“门者以名刺入,则处士也”。吕坤与年近70岁的梁补“一见若平生,而处士亦自谓慕余若余慕处士云”(吕坤《处士梁少澜墓志铭》)。此后,梁补便在吕坤家教习其两孺子。“孺子方离乳抱,顽蒙不可驯,处士以母道师之,孺子乃驯。数月戛戛,长则成人。”是时,梁处士与吕坤夜谈于邸舍,对他说:“子公无他望,我死望为我铭。”吕坤笑答:“生子先,死知谁先邪?藉令余后死,余不敢忘。”待吕坤上疏神宗以病乞休归乡,梁处士已去世。但吕坤信守与处士之诺,为之撰《处士梁少澜墓志铭》。

吕坤与王述古为忘年之交。王述古,字信甫,禹州人。曾任刑部湖广司员外。

时荆州乡居同知胡化患癫狂症,为妖书事前往京师诬告大学士沈鲤、礼部侍郎郭正域和已经致仕的吕坤等人。述古尽力为之辩白冤情,被株连入狱。后出狱,出任为常州知府,升阳和兵备副使,后加任山西布政使。吕坤为王述古父亲撰有《王禹川墓表》。

吕坤与同乡苗文英结好,两人同领嘉靖辛酉科乡试。苗文英因母病失明,矢志不仕家居。吕坤讲身心性命之学,他每次都参加,领会参悟,故遂借“去伪”二字以名其斋。

此外,吕坤曾撰《祭王懿庵文》,追述自己少时尝就学于坤姊之子王懿庵家,外甥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之情。还曾撰《乔乐义墓表》,解读宁陵乔、吕两氏联姻之缘,彰表与自己颇密的乔乐义躬身义行教育,使乔氏族人人才辈出的事迹。吕坤还对曾任宁陵教谕、从学于自己的四川内江人撰有《捲班说——送尤虚吾之建武学正》。

与汤斌:穿越明清 同籍实政大儒



汤斌像

吕坤在清代被推崇,与清初几位经世名臣的宣扬与表彰不可忽视。首先需要提及的就是汤斌。

汤斌(1627—1687年),明末清初睢州(今河南睢县)人,康熙誉其“理学名臣”。他与吕坤同属归德籍,虽生不同时,但却情谊笃厚。其墓在吕坤的家乡宁陵县己吾村村。

汤斌推重吕坤,在言、行两方面都有表现。汤斌在《重修中州会馆记》中即将吕坤与诸中州先贤并提。他撰写的《志学会约》,就收录了选自《呻吟语》的七条讲学为人学道理的语录。在教导门人和与朋友论学评事时,汤斌也不忘将吕坤和其他前辈作为示范,如对门人窦克勤说“《实政录》不可不读也”(汤斌《门人窦克勤手述五十条》);对田箕山说“吾郡先哲,如轩介肃、吕司寇、沈文端、宋庄敏、杨晋庵,皆一代伟人,海内共知”(汤斌《与田箕山书》)。他还特别强调了吕坤著作最值得教授子弟、妇女以化民成俗。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解扬认为,综合来看,从学术的角度表彰乡先贤,是汤斌关注吕坤并最终模仿其行政的直接原因。

这一思路最重要的成果和表现,是汤斌于清康熙十二年(1673年)撰成的《洛学编》,将吕坤纳入中州学脉的传承统序中,予以定位。书中吕坤传记文末,汤斌附上了一段论赞吕坤功业及思想成就的文字:“余居近先生之里,见其邑之城郭井野、里甲赋役之法,与夫冠婚丧祭、宴飨丰约之仪,皆先生手定,数十年无敢改易者。儿童妇女,至今犹称吕夫子也。其《实政录》所载,如乡约保甲、义仓社学、编审丈量、养老字幼,种种俱有成规,周详通变而无烦琐难行之患。余潼、虔之政,实奉先生为师。至《呻吟语》,性命理欲之辨,天道人事之宜,真体用兼备之儒也。其子孙守其遗教,周旋步履,俱有常度。余每过宁陵,必瞻拜先生之祠,低徊留连不能去也。”(《洛学编·吕新吾先生传》)

其意在于表彰吕坤不单自己持身严正,且能影响吕氏子孙都严格律己,所施行的乡里管理、赋役方法,至少在家乡得到了较为长久的施行并有明显效果,这成为出身邻邑的汤斌模仿施行的鼓励因素。对汤斌从吕坤经世思想中的获益,则如他所说,在陕西

潼关、江西虔州任上,“奉先生为师”,曾遵照吕坤《实政录》中所载的政事精神处理行政,实政为民,且其所撰颁行条约,多引自该书。

从吕坤思想的发扬和著作的传播角度看,汤斌的赞誉和在实际上的追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,这影响到他的朋友和学生也对吕坤的生平、著作发生兴趣。他的好友耿介和学生彭定求便是这类人物。耿介被汤斌称为“当代真儒”(汤斌《与耿逸庵书》),他所著的《中州道学编》,即收录吕坤的传记和语录。江苏常州人彭定求从学于汤斌,他的《儒门法语集》收录了吕坤的《理欲生长极至图说》和《身家盛衰循环图说》两文。

由于汤斌等诸多清儒的极力推荐,吕坤在清代很受推崇。《清实录》载同治九年(1870年)闰十月乙亥日,同治皇帝下谕,依御史吴凤藻所奏,令江南、湖北、浙江等省所开书局,刻吕坤所著《实政录》,以利其“广为流布,俾收实效而饬官方”(《清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一三五)。皇帝支持刊刻并传播吕坤著作的意见,是级别最高和最为重要的官方肯定声音。

文/图 马学庆